



诺贝尔文学奖 获奖作家作品导读

易晓明 主编



首都师范大学教材建设项目

诺贝尔文学奖 获奖作家作品导读

易晓明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作品导读 / 易晓明主编.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5
ISBN 978-7-5336-7742-8

I. ①诺… II. ①易… III. ①世界文学—文学欣赏
IV. ①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29710号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作品导读

NUOBEI'ER WENXUEJIANG HUOJIANG ZUOJIA ZUOPIN DAODU

出版人:郑可
质量总监:武常春
责任编辑:邵旻
装帧设计:阮娟
责任印制:陈善军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地址:合肥市经开区繁华大道西路398号 邮编:230601
网址:<http://www.ahep.com.cn>
营销电话:(0551)63683012,63683013
排版:安徽创艺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合肥创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18.5
字数:500千字
版次:2015年12月第1版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价:39.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既不高估 也不低估

陈众议

众所周知，诺贝尔文学奖的表彰对象是“最近一年来”“在文学领域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之最佳作品”的作家（偶尔兼及哲人、史家）。自1901年首次颁奖以来，除1914年、1940年、1941年、1942年、1943年因战争之故打烊小憩外，该奖项先后惠及百余位作家，其影响也逐渐从欧洲扩展至全球。

但是，撇开莫言、门罗、莫迪亚诺等少数几位，从新世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名单和他们的作品可以看出，一向表示拥抱理想主义的诺贝尔文学奖（以下简称诺奖）确实颁给了不少有着明显自由主义，甚至无政府主义倾向的作家。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这种倾向便开始强烈地凸显出来。在这之前，譬如“冷战”时期，这个奖项也曾落到一些左翼知识分子身上，譬如萨特、聂鲁达、马尔克斯等，从而体现出相对的包容性。当然，这种包容性和20世纪中叶西方知识分子的普遍“左倾”有关；同时，它并未因之而放弃眷顾苏联流亡作家。由是，我们有理由认为，诺奖的评选原则并非铁板一块，它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一定的政治倾向性。而“理想”之谓实在失之于宽泛。指向未来的乌托邦是理想主义，批判现实、否定存在即合理、认为人心不古也是理想主义；彰显个性的标新立异和拥抱风俗主义、地域主义是理想主义，追求最大公约数、奉行世界主义也是理想主义。如此等等，使我们难以一概而论。

老实说，除个别情况外，前十几年的诺奖得主中鲜有我心仪的。我不心仪或不那么心仪的获奖作家甚至一度包括我的研究对象巴尔加斯·略萨。他早年对专制、对贫穷和落后口诛笔伐，对穷困百姓怀有深切的同情；后来他虽然在反独裁、反专制方面比较一贯，但明显站到了自由资本主义一边。再就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他的表达更为辩证，也经常兼顾地缘和文化差别，作品因而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和穿透力，内容更为厚实、风格更为鲜明。这之后，他的自由主义倾向愈演愈烈，甚至常有拥抱极端个人主义的倾向，尽管跨入新世纪后情况有所改变。因此，我承认，他是一名善变的、童心未泯的伟大作家。

相形之下，我更喜欢勒克莱齐奥，因为他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关心人类原生态文化，对一些非洲土著文化、拉丁美洲印第安文化也充满了感情。这种关心多元文化和弱势群体（民族）的心志值得尊敬。当然，对他所显示的世界主义色彩，我又不能不有所保留，盖因我们这个社会、这个世界毕竟还有阶级，而且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依然盛行。

总体说来，最近十几、二十年的获奖作家在艺术追求上（无论题材、主题、方法）具有相对一致的严肃性。但就个人审美和价值判断而言，我认为至少耶利内克、穆勒是被高估的。方家诸公，见仁见智，自有分说；读者看官恕我不揣浅陋和冒昧吧！

言多必失。上述观点已然有失偏颇，甚至过于武断，故而完全不足为凭、不足为信。老实说，应易教授之邀为此书作序，我却之不恭，接之有愧，颇感为难，踌躇间顾虑多多，盖因此命题作文非同寻常：谁也不能面面俱到，更加无法深入肌理。于是，我只能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也罢，一家之言，无非聊表心迹，譬如献个木鱼，供人敲击；亦仿佛为本项目各位专家的悉心评乱打个鼓、敲个锣，虽轻不得、重不得，然仿声吆喝着开道罢了。

然而，身在知名的文学研究机构，我又不能对诺奖视而不见。归根结底，它曾经是、依然是，而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仍将是世界文坛举足轻重的一个坐标、坐标一个。因为举足轻重，所以它多少具有引领风尚的功用。当然，出于个人信仰或国家意识形态等原因，曾有一些获奖者拒绝领

奖,也有一些被奉为泰斗或定于一尊的作家与之失之交臂。前者有萨特和帕斯捷尔纳克,后者有托尔斯泰、乔伊斯、卡夫卡、博尔赫斯、鲁迅,等等(这个名单几可无限延续)。有趣的是,萨特的拒奖理由居然是不愿“受到约束”,因为他“只想做个自由人”,言下之意是诺奖有严重的政治倾向性。他甚至扬言,“一个作家应该真诚地做人”。言下之意是那些兴高采烈接受诺奖的作家不够真诚?也许他只不过是借借此刺激一下先其获奖的加缪,却不小心一竿子打翻了一船人。可见问题并不那么简单。至于我们自己的作家鲁迅,这几年频繁来访的埃斯普马克先生就曾明确表示,鲁迅谦虚地谢绝了有关推荐。这早被史料所印证。鲁迅的谢绝理由更简单,即认为中国还没有配得上这个奖赏的作家,又何必那个虚荣!与此同时,瑞典文学院始终强调非政治标准。诚哉斯言?

顺言之,在过去的十几年间,我和我的同事们邀请了多位诺奖作家访华,也曾向瑞典文学院推荐过心仪的中外作家。在我所推荐的中国作家中,莫言是其中之一;而在所推荐的外国作家中,我特别看好以色列作家奥兹。因为后者的民族和解意愿令人钦佩。他努力选择不偏激、不极端的“第三条道路”,并认为生活的智慧首先是教人妥协。但是智慧的奥兹迄今未能获奖。我个人揣测,最终影响评选结果的,除了十八位大评委(瑞典文学院全体院士,有时还因故不到十八位)和五位终评委,欧洲王室、西方政要、历届诺奖获得主的意见较为重要,而所谓知名学术机构和文学教授的意见也许只能权做参考,何况瑞典文学院常常还会有所偏侧地选择推荐者。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与瑞典文学院和评委会颁布的遴选条例相去甚远,或谓相反相成。

然而,且不说意识形态和获奖者参差不齐的事实,这样一个奖项,上百年执着地拥抱和重视文学这个“无用之用”,在如此重物质、重实利的时代,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其对文学的贡献不言而喻。这要感谢诺贝尔先生。然而的然而,它终究不是衡量文学的唯一标准。

如今,莫言得奖了,门罗得奖了,莫迪亚诺得奖了。以后还会有很多作家获此殊荣。这是瑞典文学院有意选择的平衡(地区或国别、语种和性别、体裁和内容,等等)。正因为如此,我选择了既不高估,也不低估这样一种评价。这是中庸之道。需要说明的是中庸并非原则的疏虞,而是尽可能中道辩证、客观公允、不偏不倚、进退中绳。单说在后现代主义解构风潮之后,理性主义和辩证法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真理的客观性遭到了怀疑。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对于诺奖还是世界文学,莫言和门罗等人的获奖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标志着诺奖的某种转向。这种转向对文学当不无裨益。首先,莫言的获奖使中国作家开始进入诺奖家族;其次,门罗的获奖多少意味着古典传统的复归;再次,莫迪亚诺的历史观依然是我们面对未来的重要依据。

但最后我还是要说,全球化浪潮汹涌,世界一体化势不可挡。因此,在世界文学市场的天平上,理想主义未必拔得头筹,其结果便是村上春树战胜大江健三郎、郭敬明战胜莫言、阿特伍德战胜门罗、米索战胜莫迪亚诺……这毫无悬念。诺奖即使由衷地“淡化意识形态”,也必定和参与本项目的诸位专家一样,回天乏术!更何况淡化一种意识形态必定意味着拥抱另一种意识形态,就像反政治也是政治一样。当然,这不影响我们研究诺奖,研究这些被它经典化的作家作品。他们是说不尽的,其丰富性和复杂性或可反过来佐证诺奖所呈现的妥协、平衡,及其诸多我们不得而知的努力。去掉排中律,诺奖多少也是文学钟摆效应及其所蕴含的无限丰富性和复杂性的一个有力见证。诚然,每年一个(最多两个)毕竟是大海捞针,偏颇和遗珠之憾在所难免,而后者或许恰恰是文学的有用与无用、继承与借鉴、守望与鼎新、写实与虚构、庄严与通俗、民族与世界等诸多因素梭动、碰撞、扬弃、化合过程中最可探讨的一环。因此,研究这个奖项的意义不仅在于奖项及其作家作品,而且必将由此及彼地对世界文学的昨天、今天和明天给出足资借鉴的不同方法与向度。为免喧宾夺主之嫌,我且就此打住。

是为序。

2015年6月于北京

目 录

既不高估 也不低估 / 陈众议	1
-----------------------	---

欧洲

英国	1
鲁德亚德·吉卜林(1907年)/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陈兵	1
约翰·高尔斯华绥(1932年)/湘潭大学外国语学院 胡强 华北理工大学 盛小弟	10
托·斯·艾略特(1948年)/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易晓明	17
维·苏·奈保尔(2001年)/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 周敏	30
哈罗德·品特(2005年)/北京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陈红薇	41
多丽丝·莱辛(2007年)/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黄华	49
爱尔兰	56
威廉·巴特勒·叶芝(1923年)/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章燕	56
萨缪尔·贝克特(1969年)/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曹波	66
法国	76
安德烈·纪德(1947年)/淮北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 辛葺	76
弗朗索瓦·莫里亚克(1952年)/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吴康茹	83
让-保罗·萨特(1964年)/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吴康茹	90
德国	100
托马斯·曼(1929年)/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曾艳兵	100
赫尔曼·黑塞(1946年)/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杨俊杰	108
苏联	116
鲍利斯·帕斯捷尔纳克(1958年)/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湘潭大学文学与 新闻学院 何云波	116
米哈依尔·肖洛霍夫(1965年)/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 曾思艺	123
捷克斯洛伐克	132
雅罗斯拉夫·塞弗尔特(1984年)/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学院 徐伟珠	132

北美

美国	140
威廉·福克纳(1949年)/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学院 黄敏	140
欧内斯特·海明威(1954年)/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庄美芝	148
约翰·斯坦贝克(1962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外交系 方杰	154

索尔·贝娄(1976年)/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 乔国强	160
托妮·莫里森(1993年)/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黄华	171
加拿大	181
艾丽丝·门罗(2013年)/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所 周怡	181

拉丁美洲

危地马拉	190
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1967年)/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庄美芝	190
哥伦比亚	202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1982年)/鞍山师范学院文学院 马婷	202
秘鲁	209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2010年)/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胡燕春	209

亚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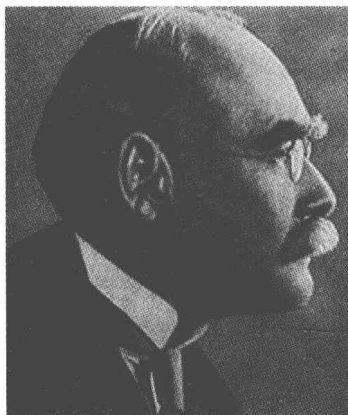
印度	217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1913年)/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李冰梅	217
以色列	228
施穆埃尔·约瑟夫·阿格农(196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钟志清	228
日本	236
川端康成(1968年)/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周以量	236
大江健三郎(1994年)/鞍山师范学院文学院 陈秀敏	249
土耳其	258
奥尔罕·帕慕克(2006年)/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陈礼珍	258
中国	266
莫言(2012年)/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张志忠	266

非洲

尼日利亚	273
沃尔·索因卡(1986年)/北京师范大学汉语文化学院 宋志明	273
南非	281
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2003年)/北京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范一亭	281

后记	292
----------	-----

鲁德亚德·吉卜林(1907年)



※获奖理由※

“这位世界名作家的作品以观察入微、想象独特、气概雄浑、叙述卓越见长”。

英国作家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 1865—1936)于190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颁奖词^①※

从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中,瑞典文学院此次挑选了一位英国作家。在过去数百年中,英国文学繁荣昌盛。当丁尼生不朽的抒情诗归于沉寂时,人们又不禁为文坛巨擘的逝去发出嗟叹,认为随着丁尼生的逝世,诗歌的时代也将逝去,再也无人延续辉煌。但实际上诗歌女神并未远遁,也未丧失其崇高的地位,她只是换上了新装来迎合新时代不同的口味。

丁尼生的作品中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不过,我们在那些与其风格迥然不同的作家那里也能发现这些特点,这些作家似乎主要关注外在事物,他们的声望也主要源于其对我们这个时代热烈而激动人心的生活的生动描绘,而这种生活又常常伴随着生存的困扰、烦恼与奋斗。本年度瑞典文学院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鲁德亚德·吉卜林正是这样一位作家。一位对英国文学颇有研究的法国作家在六年前曾写道:“他,吉卜林,无疑是英国文坛近年来出现的最引人注目的人物。”

作为一个诗人,吉卜林在出版《军营歌谣集》(1892)时就已经成熟。《军营歌谣集》都是些美妙的军歌,洋溢着豪迈和风趣,它们以现实主义的手法描写了大兵汤米·阿特金斯听从“温莎的寡妇”或者其继承人的命令,勇敢无畏地奔赴各地去面对危险与痛苦。在吉卜林那里,英国军队找到了一位代言人。他以清新独特、悲喜交集的笔触阐述英国军人所经受的苦难,描写他们的生活与工作,体现了对英国军人崇高品质的深刻认识,却又毫无装腔作势之态。在那些描写普通士兵和水手的诗篇中,吉卜林使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快乐地表达了他们的心声,因而赢得了他们的喜爱。

在1896年出版的《七海诗集》中,吉卜林表明自己是一个帝国主义者,是一个称雄全球的帝国的公民。在加强英国与其殖民地之间的联系方面,吉卜林无疑比任何一个纯文学作家都做出

① 颁奖词由本文作者编译。

了更大的贡献。

吉卜林的《丛林之书》(其第一集出版于1894年)无论在瑞典还是在其他地方都深受欢迎。在原始想象力的感召下,作家创作了这些神话般的动物故事,狼孩莫格里就在其中展现自己的力量。吉卜林在刻画这些丛林故事壮观的原始场景时展现了一种对自然的诗意的本能的感觉,显示出非凡的才情。《丛林之书》使得吉卜林成为一个深受许多国家儿童喜爱的作家。大人们在品味这些奇妙可爱、充满生动想象力的动物寓言故事时也分享到了孩子们的快乐,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孩提时代。

在吉卜林的诸多作品中,《基姆》(1901)特别值得一提。小说对那位喇嘛沿着一条能洗涤罪孽的河流去朝圣的描写格调高雅,风格温柔动人,迥异于其一贯的雄浑奔放的风格。书中描写的那位喇嘛的徒弟——淘气的小坏蛋基姆,也着实顽皮可爱。

那么吉卜林为什么能够蜚声世界,或者说吉卜林凭什么证明自己能够当此大名呢?而且,为什么他可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呢?须知一位作家必须在其思想与艺术中表现出一种理想主义才能获得殊荣。答案如下:

吉卜林也许称不上思想深邃、智慧超群,但即便是最粗心的观察者也能立刻看出吉卜林具有极为独特的观察力,能以惊人的准确性把实际生活中一些最微小的细节表现得惟妙惟肖。然而单有天赋的观察力还不足以使其成为一个大作家,无论其描写多么接近自然。他的诗才是借助一些其他的因素表现出来的。其惊人的想象力使他不但不但能够摹写自然,也能够描摹自己内心的意象。他的景物描写能激发内心的意象,就像神怪突然出现在人们眼前一样令人震惊。刻画人物时,他往往只需寥寥几笔,便让人物的独特性格和气质跃然纸上。其文学活动的基础是一种杰出的创造力。这种创造力不仅仅满足于对事物表象的照相式摹写,而是着意于揭示事物的本质与核心。

吉卜林喜欢具体凝练,其作品完全没有空洞抽象、迂回累赘的描写。他才思敏捷,写人状物时能够迅速准确地找到富有特色的词句。人们有时将其比作布莱特·哈特、彼埃尔·洛蒂,有时将其比作狄更斯。但他总是富有独创性。他的创造力似乎无穷无尽。不过这位具有丰富想象力的艺术大师同时还是一位遵纪守法的模范。丛林法则就是宇宙法则,如果要问这些法则的主旨是什么,我们会得到这样简洁的回答:“奋斗、尽职、遵从。”吉卜林就这样提倡勇敢、自我牺牲与忠诚。他厌恶做人没有男子气概又缺少自制力。在他看来,在现存世界秩序中,妄自尊大必将受到惩罚。吉卜林讴歌了诚实工作、忠于职守和热爱祖国的精神。热爱祖国对于吉卜林来说不仅仅是意味着热爱英格兰岛国,而是热爱整个大英帝国。诗人热切盼望着大英帝国的所有成员都能够团结一心。这一点从他的大声疾呼“只知道英国的人,对英国应该了解什么”中便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瑞典文学院在将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鲁德亚德·吉卜林时,谨向光辉灿烂的英国文学以及该国在当代所产生的最伟大的天才小说家致以崇高的敬意。

(节选)

※获奖演说※

由于瑞典国王奥斯卡二世于颁奖前两天驾崩,故未举行传统的颁奖仪式,吉卜林也未发表任何讲演。

※作家概述※

鲁德亚德·吉卜林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著名小说家和诗人。他出生于印度孟买,其

父曾是孟买艺术学校教师,后任拉合尔艺术学校校长和博物馆馆长。吉卜林在印度度过的快乐童年使得印度成为其心目中理想的家园。吉卜林6岁时被送回英国受教育,在寄养家庭受到虐待,心理受到创伤。1882年,吉卜林中学毕业后返回印度,担任拉合尔市《军民报》的助理编辑。由于工作关系,他深入印度底层人群的生活,对印度的风土人情以及英国殖民者在印度的生活有相当透彻的了解。1886年,吉卜林在拉合尔加入了共济会,其后期很多作品都与共济会有关。1889年,吉卜林回到英国发展,很快声名鹊起。1892年,吉卜林婚后偕妻子赴美国佛蒙特州居住,期间佳作迭出。1896年底,吉卜林一家回到英国,此后陆续在南非等地居住。1902年,吉卜林一家开始在英国苏塞克斯郡乡下定居。1936年1月18日,吉卜林逝世,骨灰安葬于威斯敏斯特教堂的诗人角。

吉卜林的创作生涯始于1884年。那一年他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百愁门》,并出版了首部诗集《回声》。其早期重要作品有诗集《机关谣曲》(1886),短篇小说集《山中的平凡故事》(1888)、《三个士兵》(1888)等。这些作品风格清新自然,生动展现了印度的风土人情,使得当时的英国读者耳目一新。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吉卜林创作的鼎盛时期。其作品对大英帝国的关注为其赢得了“帝国诗人”的称号。其诗集《军营歌谣集》(1892)、《七海诗集》(1896)、《五国诗集》(1903)等以现实主义的冷峻笔调描写英国普通士兵的生活和征战,也体现了对种族关系、大英帝国前途的关注。在小说方面,他出版了短篇小说集《生活的阻碍》(1891),闻名遐迩的动物童话故事集《丛林之书》(1894—1895),长篇小说《消失的光芒》(1891)、《勇敢的船长们》(1897)和《基姆》(1901)等。《基姆》是吉卜林最后一部以印度为题材的作品,被公认为是吉卜林最出色的长篇小说。此外,吉卜林还创作了著名的童话故事集《本来如此的故事》(1902),历史故事集《普克山的帕克》(1906)、《报偿和仙女》(1910)等。晚年,吉卜林由于丧子之痛和疾病缠身,创作上又发生了新的变化,不少作品涉及战争创伤、病态心理和疯狂、死亡的内容。这一时期其创作有诗集《中间年代》(1919),短篇小说集《多样的生物》(1917)、《借方和贷方》(1926)、《极限与更新》(1932)等。

吉卜林一生创作颇丰,尤以印度题材作品著名。其作品简洁凝练,充满异国情调,尤其在短篇小说方面成就斐然。马克·吐温曾盛赞吉卜林的作品,“我了解吉卜林的书……它们对于我来说从来不会变得苍白,它们保持着缤纷的色彩;它们永远是新鲜的”。1907年,吉卜林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英国第一位荣获此奖的作家。

※作品解读※

吉卜林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基姆》是其最后一部以印度为题材的小说。小说的背景是19世纪末大英帝国统治下的印度,主人公基姆是一个英籍爱尔兰士兵的遗孤,由一个开鸦片烟馆的欧亚混血妇女抚养长大,从小混迹于城市街头,因此熟谙印度各种宗教和种姓的风俗习惯。故事开头,基姆在街头游荡时遇见一个来印度寻找传说中能够洗涤罪恶的圣河的西藏喇嘛德秀,于是做了他的弟子,陪着他在印度次大陆游历寻找。吉卜林对这些游历的描绘是小说中最引人入胜的篇章。后来基姆偶遇其父亲生前服役的英国团队。团队长官克雷顿上校发现了基姆融入印度各种文化的能力,于是训练其为英军间谍,以其与德秀喇嘛的游历为掩护参与英国情报部门的间谍活动“大游戏”。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他们最终挫败了俄国间谍分裂印度的企图,维护了大英帝国的安宁。而德秀喇嘛也找到了圣河,获得了灵魂的解脱。

无疑,《基姆》是一部关于大英帝国的小说。但是,《基姆》与吉卜林早期描写大英帝国的小说又有所不同。其早期的小说中帝国主义倾向比较明显,经常描写高尚的殖民主义者与愚昧的土人之间的隔阂与对立。而《基姆》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这种帝国主义倾向。作为吉卜林的最后一部以印度为题材的作品,《基姆》全面体现了吉卜林关于东西方融合的观念。小说充满温情地

描写了印度的山水、习俗和人民,同时也描写了英国人和印度人相互尊敬、精诚合作、共抗外来威胁的团结精神。小说中还刻画了德秀喇嘛等丝毫不逊于英国人的当地人形象。吉卜林对原稿的修改尤其反映了他对东方/印度态度的转变。

一、英印对立与英印一体

毋庸讳言,《基姆》中表现出明显的殖民主义态度。作为全书结构主线的“大游戏”,本是英国为更好地控制印度、防止沙俄渗透所采取的间谍措施,在书中却成了维护印度安宁的英雄行为,其成员都表现出一种高度的奉献精神,这便是明证。而对英国人和印度人的描写更能体现这一点。英国人的高效、活力和技术与印度人的落后和混乱恰成对比。火车是英国人这种特征的极好体现。它们使落后的印度人对英国人充满了敬畏。连超群脱俗的德秀喇嘛在它们面前也踌躇不安。英国人的高效更体现在小牛团队的士兵身上。他们是秩序和纪律的化身,使基姆感叹不已,“他以前从未见过一个久经考验的团队在三十分钟内扎好营”。^① 而一夜狂欢之后,他们仍然能“精神饱满、行列整齐地出现在车站站台上”。^②

与英国人的高效、技术、勃勃生机相比,农业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印度人显得散漫、低效、滞重。这首先表现在他们对待时间的观念上。小说中的印度人没有时间概念,“一天二十四小时每个小时对东方人都是一样的”,“很快地——以东方人计算时间的标准”^③,这样的句子在书中俯拾即是。在这样的时间观念下,印度社会自然散漫而低效,大干道上混乱的交通即是一例。吉卜林在书中称印度为“没有形状的、灰蒙蒙的一大团”,不仅指印度的广大,也指印度的混乱。此外,书中的印度人也普遍粗俗、狡诈、爱撒谎,而且高度迷信,是典型的殖民文学中的土著形象。这些都与吉卜林早期以印度为题材的小说中的印度人形象一脉相承。

但是,相比于吉卜林早期以印度为题材的小说里的阴郁气氛以及殖民主义者与印度人之间的对立和隔阂,《基姆》的整体基调却是和谐、温暖的。这在小说的开端就露出端倪。象征着古老印度的拉合尔博物馆处在象征英国权威的大炮的虎视眈眈之下,暗寓对立之意。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出自儿童的视角,于是大炮成了“喷火龙”,博物馆成了“妙屋”,尖锐对立的现实化作童话世界,这种对立的尖锐性就大为降低,反而呈现出一种单纯与和谐。此外,虽然书中充斥着诅咒、符咒和迷信之类低级的东西,但都带着一种神秘浪漫的色彩。结果,我们在书中看不到19世纪末困扰印度的贫穷、不公、种姓和种族矛盾。相反,它成了“世界上唯一民主的国度”。^④ 书中也没有吉卜林早期小说中常有的暴力、仇恨的场景。大干道上涌动着生命和热情。基姆在大干道上的第一站醒来时就发现“他想要的那种生活——熙熙攘攘、吵吵闹闹,扣皮带声、赶牛声、车轮的吱呀声与点火、做饭的声音混在一起。而且对于会欣赏的眼睛,每一步都有新的景致”。^⑤

《基姆》中的这种和谐基调体现了吉卜林对英印关系的新思考。吉卜林创作《基姆》时,大英帝国虽正处于巅峰时期,却也衰象已现:在当时正进行的布尔战争(1899—1902)初期英军就连遭败绩。而德国、俄国等国也已崛起,开始对“日不落帝国”的各殖民地虎视眈眈。尤其是自19世纪中期开始,俄国与英国反复争夺中亚的控制权,对大英帝国,特别是印度边疆的安全产生了极大的威胁,使得许多英国人开始担心俄国对印度的入侵。面对这种严峻形势,大英帝国出路何在?对于吉卜林而言,大英帝国必须与她的各殖民地联合起来,共同面对各种威胁。而布尔战争中澳大利亚与新西兰这两个殖民地派兵帮助母国的举动证实了他的断言,这无疑使他大受鼓舞。

了解了这些,我们也就能更好地明白《基姆》中的和谐基调。在整部小说中吉卜林都力图营

① Rudyard Kipling, *Kim*,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83, p. 73.

② Ibid., p. 89.

③ Ibid., pp. 20, 23.

④ Ibid., p. 4.

⑤ Ibid., p. 66.

造出一种英国人和印度人和谐相处的景象。我们看到,普通印度人对英国人是信任的。当德秀喇嘛第一次看见火车犹豫不决时,一个锡克工匠就对他说:“别担心……上去吧!这东西是政府造的。”^①赞赏之情,溢于言表。而大干道上人潮涌动,各民族、种族、国家的人和谐共处的生动描写,印度乡村清晨的宁静美丽,“肥短的”乡下孩子的嬉戏都体现出这种宁静与和谐的氛围。甚至一向恶名昭著的英军士兵在书中也很文明,“除非喝醉了酒,否则他们不会打人”。^②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书中对1857年印度大起义的描绘。这次起义是印度人对英国殖民者压迫的反抗,涉及印度全国各个种姓和社会阶层,范围广,持续时间长,是殖民占领以来英印之间最激烈的冲突,使其后几代英国殖民者都胆战心惊,而英国殖民者对印度起义军民的血腥屠杀也在印度民族记忆中留下了深深的创伤。但《基姆》中只有一次提及这次起义,而且出自一个印度老兵之口。他曾参与过对起义者的大屠杀。在他眼里,起义是“疯狂”的,因此对起义者的屠杀是合理的,“要是恶人不杀掉,那么对于没有武器的梦想者来说,这就不是个好世界了”。^③这个已经成为普通农民的老兵无疑代表普通印度人。他对印度大起义的看法实际上是从英国殖民者的视角表达的,表明他对英国殖民统治的认同。小说中的这种描写强化了英国对印度统治的合法性,体现了吉卜林的殖民主义视角,同时也表现了吉卜林渴望英印成为一体的“大帝国”思想。

此外,“大游戏”的成员构成也别具深意。它虽然是英国特工部门的活动,但参与其中的不只是英国人。其主要成员还有阿富汗穆斯林马哈布·阿里、孟加拉人贺瑞巴布,以及印度马拉他人特工“E. 23”等。甚至“大游戏”的主脑之一,英国人罗干大人也被刻画成一个怪异的印度人模样。所有这些都齐心协力,共同维护帝国的安全。“大游戏”中这种民族和种族的融合深具象征之意。显然它表明整个大英帝国是一个由众多民族和种族组成的整体,其安全和稳定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所以,评论家威尔逊说:“要想理解《基姆》,我们只需知道,吉卜林和当时印度的大多数英国人都相信俄国人试图侵略印度。”^④

二、东西方的融合

另一方面,在《基姆》这种温情的基调中我们也能体会到吉卜林对印度所怀有的特殊情感。《基姆》是吉卜林最后一部以印度为题材的小说,是告别之作,带有怀旧的温情。从吉卜林在小说中对大干道、壮丽的喜马拉雅雪山和富有魅力的印度生活方式的温情描写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对印度的眷恋。不仅如此,此时的吉卜林对帝国主义和东西方关系有了新的认识。这在他写于1895年10月的一封信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出生在白人所谓的‘异教徒’中间并在很大程度上在他们中间长大,对于我来说是一种福气。尽管我同意每个白人都有一种崇高的职责,要遵从自己宗教和良心的教导,万事循法则而行。但那些白人——他们的政府装备着最先进的杀人武器——凭着自己并不十分了解的关于救赎的教条和一套别人不懂的道德规则来吓唬、打击异族同类,破坏他们珍视的习俗,侮辱他们的神灵,这是一种残忍”。^⑤

从这封信里我们可以看到吉卜林的人文主义精神、他对东方/印度的热爱和对帝国主义者的厌恶。这与他在自传《我自己的一些事》里谈到他后来对自己早期作品里的帝国主义因素做了总结和纠正是相吻合的。^⑥《基姆》中表现了明显的东西方“融合”思想,这里有功利性的、维持大英帝国的需要,但也反映了吉卜林对东方民族价值的新思考。吉卜林还带着欣赏和热爱的态度描写了不少印度人。他们不像英国人那样精明、实用,而是更具宗教宽容和自由精神。他们诚恳、

① Rudyard Kipling, *Kim*,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83, p. 24.

② Ibid., p. 71.

③ Ibid., p. 46.

④ Harold Bloom, ed., *Kim*, New York: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1987, p. 52.

⑤ Charles E. Carrington, *Rudyard Kipling: His Life and Work*, London: Macmillan, 1978, p. 426.

⑥ Rudyard Kipling, *Something of Myself*,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37, pp. 182—183.

好客。基姆和喇嘛在火车上碰到的农妇,以及印度老军人、老夫人都对他们热情有加。尤其是那个老夫人,虽然有点琐碎,却真心真意地照顾喇嘛和基姆,甚至在和他们分手时流下了泪水。无怪乎基姆“极愿意走出来,嚼着萎叶,看这温和的大世界里新的人物”,并且宣称“这是个好地方,这南方”。^①

但书中刻画得最成功的当地人形象无疑是德秀喇嘛。在英国人的实用性与印度人的精神性二元对立中他可以被视作印度的象征。他具有吉卜林笔下英国人的所有优秀品质。他单纯得如同孩童,连熟谙所有当地人狡猾、爱撒谎恶习的基姆对他的诚实也惊叹不已。他那不顾年高体迈,决心走遍印度大地寻找圣河以求证真理的精神尤其令人感佩。他的庄重举止和渊博知识赢得了拉合尔博物馆的英国馆长的尊敬和友谊。此外,念咒驯服发怒的眼镜蛇以及不让他的信徒惩罚抢劫他并将他打伤的俄国间谍等情节也表现了他的超群脱俗和高超的宗教修为。另一方面,吉卜林也描绘了他作为凡人的一面:一个慈爱的普通老人。他喜欢孩子,为他们唱歌,又让他们随意抚弄自己的念珠。他在不经意中也时常流露出思乡之情,“啊,那雪山,还有那山上的雪!”^② 纯朴的感喟令人动容。对于基姆他怀着一种父亲般的爱。他教他大法,晚上睡觉时“将一大半被子盖在基姆身上”。基姆的教育本与他无关,但当他看到那两个英国神甫为基姆的学费斤斤计较时,就慷慨地为基姆付了学费。他还鼓励基姆努力学习以“积累功德”,尽管这意味着此后他要独自上路,自己照顾自己。而书末的情景更是体现出德秀喇嘛的慈悲胸怀。当他已证大道、融入宇宙的“大灵魂”时,却对在尘世的基姆充满了慈悲之情,于是他忍受着大痛苦回来拯救基姆。全书是以德秀喇嘛宝像庄严一如佛祖的形象而结束的,“他双手相挂放在膝上,微笑着,正如一个人拯救了自己和自己的至爱后会有的神情”。^③ 由于这些描写,德秀喇嘛被认为是“吉卜林所描绘的第一个睿智、庄严、渊博的非欧洲人形象”。^④

吉卜林也欣赏印度的古老。悠久的历史总是让他迷恋。拉合尔博物馆里那些塑像无疑是印度古老历史的见证。而在书的后半部分,俄国间谍说德秀喇嘛那深邃的眼神“让人感到我们是那么年轻的一个民族”。^⑤ 这实际上是对德秀喇嘛和印度的赞叹。伴随着印度古老历史的,是其民族和信仰上的宽容。“整个印度到处是各式各样的圣者,用各种语言传播着真理”。^⑥ 这不仅是宗教虔诚,更是一种宽容和相互理解的精神。无疑吉卜林非常欣赏这种境界。在《基姆》中他借德秀喇嘛之口宣称:“对于追求大道的人来说,没有黑人、白人、印度斯坦人和波提亚人之分。”甚至连英国特工马哈布·阿里也说:“信仰就像马匹一样。每一种在它的国度里都自有价值。”^⑦ 这些都表达了吉卜林的民族和宗教宽容的理念以及对民族和谐的真挚向往。《基姆》第十四章的篇首诗也体现了类似的情绪:

我的兄弟跪倒(卡比尔这样说道)
在石头和黄铜面前,用异教徒方式
但在我兄弟的声音里我听到
我自己的没有解决的苦恼
他的神如其命运所赐——

① Rudyard Kipling, *Kim*,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83, p. 113.

② Ibid., p. 64.

③ Ibid., p. 261.

④ Harold Bloom, ed., *Kim*, New York: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1987, p. 66.

⑤ Rudyard Kipling, *Kim*,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83, p. 216.

⑥ Ibid., p. 29.

⑦ Ibid., pp. 191, 129.

他的祈祷是全世界的，也是我的祷告^①

吉卜林的东西方融合的思想在小说主人公基姆身上得到最好的体现。作为书中塑造得最成功的形象，基姆本身就代表了一种民族的融合：他是爱尔兰人，却在印度由一个欧亚混血妇女养大，后来又参加“大游戏”为英国人服务。在小说中基姆同时具有东方人和西方人的品格。一方面，吉卜林不断提醒我们基姆实际上是个英国人——而正是这一点暴露了吉卜林的殖民主义局限性。基姆自己也明白自己是英国人这个事实。在小说开篇与其他孩子争夺瓚姆—瓚玛大炮这个象征性场景中，基姆就表现出英国人的权威。他将土著儿童踢下炮身，宣称印度人也从瓚姆—瓚玛大炮上跌下去了。^② 基姆明白自己作为“优等民族”一分子所享有的特权。而吉卜林也赋予他诚实、爱冒险探索等所谓的“西方人优秀品质”，使得基姆作为统治阶层精英分子的身份确定无疑。但是另一方面，他完全像一个土著。他“晒得黑黑的，就像当地人一样”，“很愿意说当地的土话”，而且“和市场上的其他小孩子完全平等地交朋友”。^③ 他喜欢穿印度衣服，吃印度食物，迷恋印度的一切。

基姆对两种文化的拥抱使他经常为自己的身份感到困惑。小说中基姆多次自问：“谁是基姆——基姆——基姆？”^④他初到圣查威尔学校时并不习惯那里的西式饭菜和衣服，而是渴望自己往常所过的自由自在的印度式生活，但同时他又意识到自己是个“洋大人”。在罗干大人处受训时，他不断提醒自己“是个洋大人，还是个洋大人的儿子”，但这思索却是用印地语完成的！小说第八章的篇首诗也表达了基姆对自己双重身份的困惑，但同时也明确地表达了融合两种身份的愿望：

我感谢这块土地
它哺育了我的生命——
可我最感激真主，
他给了我的头不同的两面

衣食尽可没有
朋友亦可抛弃
但我不要片刻失去
我的头的任何一面^⑤

不过，在多数情况下，基姆身上的东方和西方品格并不相互矛盾，而是很好地交融在一起。他自由地穿行于印度大地，因为他熟悉而且喜爱这块土地，就像一个孩子对于他的母亲那样。而他对知识的渴望又使他在自己并不喜爱的圣查威尔学校里安之若素。具有象征意味的是基姆的衣着。自从到圣查威尔学校后，他平时穿着洋大人的制服衬衫，而自己又在别处藏有一件印度人的外套，可以随时取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基姆这种自由出入于两种文化之间而又为双方所喜爱的能力也是吉卜林自己的梦想，表达了他融合东西方文化的渴望。

① Rudyard Kipling, *Kim*,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83, p. 226.

② Ibid., p. 4.

③ Ibid., p. 1.

④ Ibid., pp. 106, 128, 167, 203, 254.

⑤ Ibid., p. 117.

三、对殖民主义的超越:吉卜林对《基姆》的修改

不仅如此,吉卜林对《基姆》的修改也表现了他这一时期对东西方关系的新思考。我们知道,《基姆》源于他早期写于印度的一部手稿《马图琳妈妈》,期间数易其稿,到最后定稿前后历时十余年。据学者马格丽特·菲丽称,《基姆》原稿种族主义倾向严重,但在发表的《基姆》里吉卜林已经在许多方面超越了他的种族主义。^①菲丽指出吉卜林删去了原稿中不少种族主义话语,同时增加了对印度的观察和温情的描写。他对原稿前三章里谄媚的德秀喇嘛形象进行了重新塑造,改写了第五章,又删去了第十一章里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一个片段。菲丽认为小说原稿中种族主义色彩浓厚的部分都来源于《马图琳妈妈》,在修改原稿时吉卜林已经超越了自己早期的殖民主义态度,正和小说中的基姆一样经历着认同危机,而且在感情上更偏向于东方。^②这些在小说的人物塑造上体现得非常明显。吉卜林在修改时减少了英国人形象的正面描写:克雷顿上校着墨不多,是次要人物;罗干大人在原稿中是个热爱小动物、具有宗教虔诚的特工,但在发表的《基姆》里罗干大人则没有这些正面特质,且其对基姆的催眠反而使其具有了一种阴险的特征。两位英国神职人员贝内特和维克多更是负面形象:他们先是无端地认为基姆是小偷,直到发现他是白人后才改口,后来又在基姆的教育费用问题上纠缠不休,形象明显有点猥琐。在主人公基姆的塑造上,吉卜林在修改时也淡化了其白人特征,特意描写基姆对印度的亲切感、认同感以及他如何自由地在印度大地上穿行。原稿中描写基姆为保护德秀喇嘛与俄国人打架时“爬起来朝着那挺起的肚子最后踹了一脚(亚洲人打架不是为了尊严,而是要伤害别人),然后往山上跑去”^③,这话无端贬斥东方人,认为他们阴险恶毒,具有明显的种族主义色彩,这些后来都被吉卜林删去了。原稿中的基姆非常热衷于“大游戏”,但修改后基姆则更理性地思考这个问题。另一方面,吉卜林也改变了原稿中对印度人的类型化描写,使他们更具真实性和自己的尊严。原稿中的德秀喇嘛是个普通的西藏喇嘛,幼稚、无知、无能、对别人谄媚讨好,而修改后的德秀喇嘛形象要更为高大。他成了一个西藏寺庙的住持,知识渊博,举止庄严,在英国人目前不卑不亢,为追求大道执着无悔,令人敬佩。而马哈布·阿里、贺瑞巴布也不再是典型东方主义话语里的狡诈、阴险、反复无常的东方人形象,而具有了各自的特征和可敬的品格。此外吉卜林还刻意减少了东西方文化摩擦和冲突的内容。如原稿中马哈布·阿里的父亲在战争中被英国人杀死。这个内容后来就被吉卜林删去了。基姆救助特工“E. 23”的情节在原稿中有浓厚的种族主义色彩:“E. 23”因为诱拐了一个土王的宫女而受到追杀;基姆和“E. 23”一起在火车上对付“黑鬼”杀手,成功地将其赶走。在修改后的场景中吉卜林淡化了土王、宫女等情节,也删去了“黑鬼”等对土人的侮辱性称谓,只是描写基姆为“E. 23”疗伤、化装来帮助其摆脱杀手,从而减少了原稿的种族主义倾向。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作为吉卜林最后的以印度为题材的小说,《基姆》标志着他对东西方关系思考的新阶段。尽管书中还残留着不少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痕迹,但对印度这块土地及其人民的充满温情的描写,各民族、种族的成员同心协力,共抗沙俄、维护帝国的行动都表明吉卜林对英国和印度、东方和西方融为一体的愿望。他对《基姆》原稿的修改表明,尽管吉卜林还不能摆脱他的历史局限性,但作为一个自觉的艺术家,他不仅已超越了自己早期的帝国主义态度,而且对于东西方文化及其关系的认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清醒。这种对东西方文化融合的方法和可能性的探讨结出了硕果——这便是《基姆》,“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英语小说之一”。^④

^① 由于无法见到吉卜林的《基姆》原稿,以下论述主要采用马格丽特·菲丽文章中的材料。参见 Margaret P. Feeley, *The Kim that Nobody Reads*, in Harold Bloom, ed., *Kim*, New York: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1987, pp. 57-74.

^② Harold Bloom, ed., *Kim*, New York: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1987, p. 63.

^③ *Ibid.*, p. 64.

^④ 参见 Roger L. Green, *Rudyard Kipling: The Critical Heritag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71, p. 29.

※ 阅读书目 ※

Harold Bloom, ed. , *Kim*, New York: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1987.

Charles E. Carrington, *Rudyard Kipling: His Life and Work*, London: Macmillan, 19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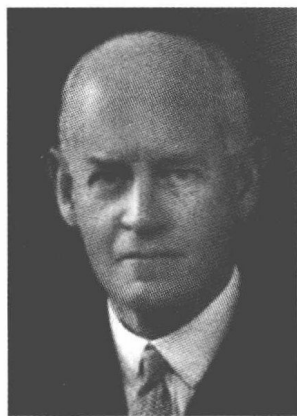
David Gilmour, *The Long Recessional: The Imperial Life of Rudyard Kipling*, London: John Murray Publishers Ltd. , 2002.

Roger L. Green. *Rudyard Kipling: The Critical Heritag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71.

J. M. S. Tompkins, *The Art of Rudyard Kipling*, London: Methuen & Co. Ltd, 1959.

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陈兵(教授,博导)

约翰·高尔斯华绥(1932年)



※获奖理由※

“为其描述的卓越艺术——这种艺术在《福尔赛世家》中达到高峰”。

英国作家约翰·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 1867—1933)于193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颁奖词^①※

他(高尔斯华绥)借着福尔赛这种人物类型,把矛头对准了上层中产阶级的富商,这些人还没有成为真正的绅土地主,可是却一心地仰慕他们,并本能地把众所周知的严格、镇静、自以为是、盛气凌人的理想绅士作为效仿目标。他们特别小心地防范那些危险的感情,但仍然免不了偶尔会出些纰漏,让激情扰乱他们的生活,让自由在财产本能的世界里抢占了一席之地。美——这里由伊琳代表——不肯与“有产业的人”共同生活;索米斯·福尔赛作为有产业的人,对她的态度愤恨不已。他最后几乎成了一个悲剧人物。这部小说是写人性的杰作,扎实有力而又独立成篇;说不准高尔斯华绥是否从一开始就想到了要给它写续集。不管怎样,待他再次着手写福尔赛时,已经事隔十五年,世界大战的后果大大地改变了生活的远景。《有产业的人》得到了扩展,添加了《骑虎》(1920)、《出租》(1921)和两个作为插曲的短篇。至此《福尔赛世家》全部完成。

这部编年史式的小说的前景记述的是福尔赛家族的人的日常生活,是种种的个人际遇、冲突和生活悲喜剧。但在背景里读者可以看到历史事件的深色经纬线。每位读者都一定记得那一章——描述了索米斯和他的第二个妻子在一个阴沉沉的日子里站在海德公园围栏旁看维多利亚女王出殡,随后又简略地回顾了女王登基以来的这些年,“社会风气变了,习尚变了,人变得离猿猴更远了,上帝变成了财神——而财神爷被人捧得也自以为是上帝了”。在福尔赛系列小说中我们看到了维多利亚时代如何演变、瓦解,直至我们的时代。

观察高尔斯华绥本人的观点在这些小说中如何逐渐演变,也是很有教益的。他最初激进地批评现存文化,后来评价事物时变得较为公允客观,最后采取了更自由化的纯人道主义观念。对此人们常举的例子是他对索米斯的处理。索米斯是个标准的民族类型,起先被大加讥讽,后来描写的笔触里有了些尊重,尽管作者似乎不情愿,这尊重却渐渐增加,最终化作了真正的同情。

对于高尔斯华绥,索米斯成了静态的老英格兰的一个最后的代表。我们被告之说,他从不欺瞒;他的做派也许令人不堪忍受,却是真实的。高尔斯华绥的写实主义以这种方式本分地向索米斯式的冷静平淡的尊严表示了敬意,而这一点被认为是他对人性评价的一个根本因素。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冷嘲的怠倦的放纵行为变得越来越摩登,这位编年史作家发现,自己过去不赏识

① 颁奖词节编自黄梅的译文,见约翰·高尔斯华绥:《有产者》,周煦良、黄梅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92年。